

媒体评说

《京华时报》

拆迁必须让黑势力走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铨认为, 强拆不仅仅是对居民人身和财产造成了威胁, 还给社会带来一种恐惧。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犯罪形式, 应该严惩。诚哉斯言! 对这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有关部门应该严肃处理, 维护法律尊严, 捍卫公民权益, 为公众打造一个安全而祥和的生存环境。事情的悲哀之处在于, 为何总有一些人为了己之利, 视法律为手纸, 粗暴地践踏他人利益? 拆迁也要“打黑”, 坊间如此呼吁。对黑社会式的强拆, 确实应该毫不留情。严打之余, 更应该重建社会秩序, 重构各种利益主体的敬畏感、守法意识, 避免弱者恒弱、强者恒强, 遏制丛林社会出现, 每个人才有安全感。

《长江日报》

解决好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国务院近日召开廉政工作会议, 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他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 就会“人亡政息”。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全民公敌。什么原因造成腐败的泛滥, 根子上是过于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腐败是政治的最大毒瘤, 怎么形容其危害都不为过。腐败的根源在制度。邓小平曾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一个富有政治理想和政治责任感的执政党, 不仅出于政权性质可能改变或“人亡政息”的自我危机感, 更出于对国家、人民和历史的高度负责, 把腐败这个问题解决好。

副市长的“脏话”能否骂退“脏水”

□王孝武(武汉)



环境保护

广东东莞松木山水库出现大面积死鱼现象, 水厂第一时间给出的解释是“跟回南天有关”。3月27日, 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痛斥“天气说”是在“放狗屁”, 并直言自己经常去明察暗访, 发现不少的污染源都在偷排污水。(新闻见今日本报A22版)

在大会上脱口而出骂了一句“放狗屁”, 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在网民心目中的形象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陡然间“高大”许多,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 骂脏话不过是小节, 而能为市民说话却是大德。我也很欣赏梁国英个性鲜明、敢怒敢言。但在叫好的同时, 我还有一丝担忧: 梁副市长的“脏话”, 能骂退松木山水库“脏水”吗?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 水库大面积死鱼, 罪魁祸首往往是水质污染。作为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梁国英, 对这个问题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他还直言, 自己经常去明察暗访, 发



子今图

现不少的污染源都在偷排污水。因此, 当大朗自来水厂将死鱼归结为“天气原因”时, 梁副市长勃然大怒, 爆粗口。

话说到这里, 问题就出来了。有些网友提出疑问: 既然梁副市长明知死鱼是污染所致, 并且在明察暗访时发现了有人在偷偷排污, 当

时为什么没能责令环保部门予以查处, 并对排污者予以严惩呢? 就算当场查处不方便, 那事后为什么不及时查处, 而等到死鱼了、媒体曝光了, 才着急上火呢?

对于网友的疑问, 恐怕梁副市长也不好回答。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污染问题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众所周知, 环境污染大多和经济发展相生相随。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地方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只顾GDP成绩单的亮丽, 而忽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对企业排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还沦为排污企业的保护伞, 上级有检查时, 通知企业停工或者打开污水处理设施, 检查组一走, 排污依旧。

梁国英副市长冲冠一怒骂脏话, 骂得大朗自来水厂低头认错, 直言“已经不抽松木山水库的水了, 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水的安全”。但梁副市长的“脏话”, 能否骂退松木山水库“脏水”, 却仍待进一步观察——毕竟, 那些排污的企业, 排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读报短评快



对茅台市值一天蒸发142亿的思考

近日“禁止用公款买高档酒”一声令下, 高端白酒股价应声下跌, 27日跌幅达到2.18%, 其中贵州茅台狂泻6.37%, 市值一天就蒸发了142亿元。(3月28日《广州日报》)

以茅台、五粮液为代表的高档酒股价大跌、市值缩水,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温家宝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 “禁止用公

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为何仅仅是在会议上强调一下, 茅台为代表的高档酒股价就如此暴跌, 反应竟如此剧烈呢? 如果“禁止用公款买高档酒”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那么, 对于高档酒将造成怎样的重创呢?

禁止公款购高档酒致高档酒股价暴跌, 再一次佐证了高档酒消费群体是公款, 是公

职人员和官员。3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一报道说, 当前公务接待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许多地方, 领导干部几天没有饭局就“馋酒”, 一些领导70%的时间都花在酒桌上。而且公款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 主菜是鲍鱼、鱼翅、河豚, 酒是茅台、拉菲等。一顿饭局动辄都在万元以上。这使得笔者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那次大刹公款吃喝风, 迅即便使得许多饭店接连倒闭。现在的公款吃喝风比那时严重得多、档次高得多。从国务院一语禁止公款购买高档酒, 茅台等高档酒股价就暴跌, 再次说明公款奢侈消费之风多么严重。

余丰慧

紫荆山百货 活动日期: 4月1日(日)-4日(四) 距4月1日紫百29年店庆 90%品牌 500送290 800送290 店庆倒计时预存1000送50 300辆自行车免费大抽奖



公民监督

3月25日, 浙江省环保厅正式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布24日7城市(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的PM2.5监测数据。最高的是宁波, PM2.5浓度为49微克/立方米; 其次是绍兴; 杭州排在第四位; 舟山的数据最小, 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远低于我国刚刚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设定的PM2.5平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的标

准。7城市均为优秀。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2012年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开展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测, 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浙江则提前3年对5个地级市进行了检测。态度之积极, 反应之迅速, 令人喜出望外。

大家都看到了, 首次公布的数据非常漂

首次公布的PM2.5数据的可信度

□王学进(浙江)

亮, 按理说, 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居民该放心了, 出门不必再戴口罩了。但这些数据是否真的意味着7城市的空气质量均为优秀, 企业的碳排放标准和汽车尾气的污染指数均达标了呢? 不好说。咱们且慢津津乐道这些数据, 沉浸在满心喜悦之中。

我这么说并非杞人忧天。其一, 环保厅选择首次公布的时机非常好。入春后, 浙江经历了罕见的长达一个多月的雨季, 上周末刚放晴, 空气质量特别好。对此, 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其二, 监测站所处位置较好。以宁波为例, 监测站设在宁波高专、宁波中学、宁波市中、北仑环保大楼、龙赛医院, 这些都是低污染区, 得出的检测结果自然好了。其三, 检测仪器和检测技术有待检验。有资料显示, 这款检测仪器由于没有加装一种用于收集挥发性颗

颗粒物叫FDMS的分析仪, 测出的数据会比实际值低15%左右。据业内人士称, “震荡天平法不加FDMS是不达标的”。此前传得沸沸扬扬的美国驻华使馆检测到的PM2.5数据迥异于北京市环保部门检测到的结果, 就说明了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不同会得出结果迥异的数据。

所以说, 对浙江首次公布的7城市PM2.5检测结果不必盲目乐观, 而是应冷静分析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仅将其作为一种参考, 重要的是从我做起, 多乘公交车和骑车上下班, 低碳出行。尤其是企业, 应严格恪守碳排放标准, 加大减排设备投入, 减少水汽污染。最后, 我要提醒一句, 7城市的政府部门切不可将首次公布的检测结果作为衡量环保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准, 甚至将其作为政绩拿来炫耀, 从而掩盖对GDP的追求。



教育公平

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引关注的背后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最近有报道称“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 引起社会关注。而一引起关注, 就不免会有人出来“解答”, 此次的解答是: 这项社会学研究的一位主要研究者告诉“中国网事”记者: 这是断章取义。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来是网民们将这次社会学研究者公布北大学生档案数据中家庭为“干部”的, 认为都是官员家庭, 而事实上, 在中国, “干部”与“官员”是有区别的。

这真得注解一下。据本人所知, “干部”一词是从苏联来的。改革开放前, 由于是计划经济, 至少在农民眼里, 对凡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 一律都以“干部”相称——你即使只是粮食部门一个一般的职员, 农民交粮时也一定称你为“干部”。如果你姓张, 那就一定称你“张干部”。

这样一解释, 说明有的网民确实没有弄清

中国“干部”与“官员”的区别。但如果客观地说, 就这样指责网民“断章取义”, 一是“词不达意”(不能把没弄清区别称为“断章取义”), 二是也有点过于简单化了。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应作分析, 为何一谈“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 有些网民就那么“愤愤不平”, 这背后其实隐含了许多的不满与无奈。正是这不满与无奈, 让那些网民们一旦遇到一个“引子”, 即使没弄明白, 也会爆发出来。

中国教育资源的现状, 一般来说, 大城市不及北京、上海这些超级大都市, 中等城市又不及大城市, 一般的市、县又不能与中等城市比, 最后, 乡下的教育资源——除了沿海少数已经非常发达的乡镇——比一般的市、县差。正因教育资源的这种差别, 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质量, 影响学生的成绩。

这还不算, 每年北大招生在分数上还有一

定的“倾斜”, 或叫照顾。一个北京的考生与一个河南的考生考出相同分数, 北京的考生就有可能上北大, 而河南的考生估计连报名北大的资格都没有。

正是因为这些不公(当然远不止这些), 一直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研究的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指出, 虽然多年来要求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 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 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 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

而此次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引起的关注正是“不良社会影响”的一个反应。